



家庭法的死亡与再生：从平等主体法到弱者保护法

赵 毅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家庭法调整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和其他家庭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家庭法是平等主体法,但这既与事实不符,也有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之嫌,从而漠视了真正需要保护的家庭关系弱者。家庭法平等主体说反映了家庭法回归民法的努力,但却造成了家庭关系物化的后果。从“财产”到“人”的民法理论转型使家庭法从死亡走向再生,在承认共同具有公私混合法属性的基础上,家庭法可以统一于民法,并在弱者保护法的定位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人”的保护。

关键词:家庭法; 婚姻法; 亲属法; 平等主体法; 弱者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DF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7-0094-05

一、“家庭法”的论域界定

(一)“婚姻法”还是“家庭法”

中国并不存在以“家庭法”命名的单行法,现行婚姻法既包括了婚姻关系,也包括了家庭关系。从逻辑上说,婚姻是家庭的前提和形成原因之一,家庭是婚姻的当然结果,家庭关系可以覆盖婚姻关系,但婚姻关系则不能容括家庭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将全面调整家庭关系的法律指称为“婚姻法”,也是中国独有。^[1]尽管有学者提出了“广义的婚姻法”概念以解释现行婚姻法的调整范围,^[2]但这仍然难以解决“婚姻法”这一名称自身在周延性上的严重不足问题。事实上,家庭法关注的问题范围显然要比婚姻法广得多,除了关于结婚、离婚和夫妻关系的问题外,还要关注亲子关系、监护、扶养等问题。^[3]在中国内地的学术界,也日益开始使用“家庭法”或者“婚姻家庭法”的学理称谓界定现行婚姻法的实际内涵,后者保留“婚姻”二字主要是考虑到社会公众多年来的习惯与熟悉度,否则,作为“家庭”的题中之义,“婚姻”与“家庭”显然只能是包容关系而无法并列。

(二)“亲属法”还是“家庭法”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已经难以被称为“家庭成员”,从而将调整这些近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称为“家庭法”是不严谨的,而只能以“亲属法”代之。^[4]还有学者认为,收养法和各种涉及亲属回避的法都超出了家庭法的范围,最远可达三代内旁系姻亲,所以原本以婚姻家庭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也在不可逆转地潜变为以更广泛的近亲

属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5]这些说法并没有准确把握家庭法的内涵。作为一个习惯性的学术用语,“家庭法”在西方国家普遍地被认为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概念,目的就是为适应家庭生活多样化的需要。尽管对其界定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潮,但无疑,它是“界定家庭地位的法律,通过婚姻、血缘或者收养来操作法律何时可以旨在保护家庭成员。”^[6]在这个意义上,对家庭法涵盖范围过小的批评并不成立。当然,基于曾经的民国民法典传统,在现今中国民法典编撰的意义上采用“亲属法”的称谓,亦无不可。两者的适用范围是同样的。

二、家庭法作为平等主体法的质疑和证伪

(一)家庭法作为平等主体法的质疑

根据我国家庭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平等”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六十年来根本价值取向和目的。^[7]由于家庭关系主要包括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作为家庭法第一要义的“平等”理应包括夫妻关系平等和亲子关系平等。

在立法上,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对男女平等、夫妻关系平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 105 条:“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继承法》第 9 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婚姻法》更是从一般原则、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 3 个方面肯定了夫妻关系的平等。^[8]就前者而言,该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 4 条规定:“夫妻应当……维护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中者而言,该法第 13 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就后者而言,该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

作者简介:赵毅(1979-),男,江苏江阴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讲师,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的处理权。”但对亲子关系平等的立法阙如。在学理上,我国家庭法学的权威学者将亲子关系平等界定为“父母子女之间以及祖孙之间的平等”,它与兄弟姐妹的平等和夫妻关系平等共同构成作为平等主体法的家庭法基本原则。^[8]根据学者的解读,夫妻关系平等表现为夫妻在拥有姓名权、人身自由权、住所选择决定权、遗产继承权上的平等,且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及相互抚养的权利与义务;亲子关系平等则表现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同时享有赡养扶助的权利;父母可以继承子女的遗产,子女也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祖父母和孙子女、外祖父母和外孙子女之间也享有平等的抚养和赡养的权利与义务。^[9]

可以说,从 1950 年至今的 60 余年间,我国婚姻法历经三次主要修法,通过不断废弃两性不平等条款,基本上建构起了男女平等的婚姻法规范体系。但是否我国家庭法就能定位为“平等主体法”,则不无疑问。首先,并无任何法律条文有亲子关系平等的规定,甚至就夫妻关系的定位,立法者也有着其它考虑,而非绝对地认同其平等性。我国《婚姻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这说明,在另一个侧面,立法者把女性与儿童和老人同等视之,定位为保护关系中的弱者。其次,即使是持“平等主体说”的学者,也承认平等并非一成不变,“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使得人客观地异化为强者和弱者时,当劳动者、消费者、妇女、未成年人、老人等群体作为弱者的代名词时,法律需要对这些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8]第三,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平等也并不彻底。根据蒋月教授的归纳,这些不平等包括了结婚上的不平等(如法定婚龄条款的男女不平等)、离婚上的不平等(如对军婚的特别保护导致的对女性不利)、亲子上的不平等(如子女从母姓条款适用难)等。^[10]夫妻关系上的平等都如此难以达致,更遑论亲子关系平等呢?如果父母子女是平等的,毋宁“儿子就会拥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利,他拥有他父亲约束和惩罚他的同样的权利,可以同样约束和惩罚他父亲。”^[11]追求这样的平等显然是荒谬的。

(二) 家庭法作为平等主体法的证伪

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的历史。就亲子关系而言,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不平等是绝对的。那种将“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同时享有赡养扶助的权利”视为亲子平等的做法纯粹是一种牵强的概念偷换,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正是建立在双方不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而在后者成年后承担的对前者的赡养义务恰恰证明了新的不平等:成年的子女与蜕变成老人的父母。只是保护关系的对象恰恰进行了调换而已。从前,是父母保护未成年子女;如今,是成年子女保护年老的父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巨擘梅迪库斯坚持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是一种隶属关系,^[12]英国保王政理论家罗伯特·菲尔麦甚至用子女对父亲的屈从关系来为王权制辩护,因而王权来自父权,如果父权不可避免,则君主制也不可避免。^[13]

就两性关系而言,尽管《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等重要国际法文件都在大力倡导人权与男女平等,尽管各国都在致力于与男女平等有关的各项法律与体制的完善,但仍然不可否认: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则是相对的。对两性平等进行的法律规制并不能克服与避免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规制当然也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必然受到社会的、宗教的、教育的和习俗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尽管人们在两个世纪前就向往并且为了实现男女平等而在不断努力,但现代社会对女性权利承认的步伐迈得仍然是那样地毫不情愿与步履维艰。^[14]周安平教授指出了这种平等的虚幻性,它是自然法学派的学者在论述平等的政治理想时精心构筑的社会契约和“无知之幕”神话,人们以为藉此就能够缔结平等、创造公正,而事实上,这些理论只能说明男人彼此之间平等地位的最初法律诉求,却不能导致男女两性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相反,社会契约论的结果反而掩盖了性别等级,并因为这一掩盖而强化了性别歧视。^[15]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在工作上得到了平等,但在闲暇时间上却未得到平等。在中国,在‘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的毛泽东号召下,铁姑娘突击队、‘三八’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女子远洋运输船等盛行一时,在抬高妇女地位的名目下对她们进行摧残。”^[3]

这都说明,我国立法和主流理论对夫妻关系平等的宣示都是也只能是规范上的平等,而对于亲子关系而言,则从来不存在着平等。黑格尔清楚地揭示出家庭关系不同于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的本质区别。“平等”的市场交易与社会交往秉持利己原则,而家庭的基础是以利他为基础的“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种爱“能够在没有仔细权衡与比较他人和自己需要的情况下满足邻人的需要。”^[16]中国的传统文化观也一直认为,家庭的本质属性是伦理性,而伦理关系“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着。”^[17]可见,将家庭法定位为平等主体法,既与事实不符,也有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之嫌,从而漠视了真正需要保护的家庭关系弱者。

三、家庭法的死亡

(一) 家庭法的分离与回归

受罗马法传统和康德“婚姻契约论”的影响,近代大陆法系主要国家都将家庭法包含于民法之中,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但是,由于民法分为人身法和财产法两个部分,寻找两者的共性以证明它们共处一法的理由是 18 世纪的部门法运动以来一直困扰世界法学家的难题。^[18]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婚姻伦理观,受此影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立了独立的家庭法典并将之从民法中分离。苏联学者从意识形态角度详细阐述了家庭法独立于民法的理由:“家庭法中的根本问题是家庭成员间的人身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配偶间、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笼统地划到财产关系中去,这一点是



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家庭、父母子女关系等等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法所研究的财产关系。……婚姻、家庭、监护等问题的法律调整是社会关系中极为特殊的范围,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把家庭法分为苏维埃法的一个独立部门。”^[19]吊诡的是,在伊斯兰国家,也发生了普遍的家庭法与民法的分离现象,而且这种分离比苏联还早得多。土耳其帝国于 1869 年颁布的《奥斯曼民法典》首开先例,这部民法典被处理成单纯的财产关系法,另外于 1917 年制定了个人身份法以调整身份关系;1883 年的《埃及国民民法典》承袭之,并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可见,家庭法与民法的脱离,并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要把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安排在同一部法典中,就必须找到一个证明他们同一性的理由。^[18]

新中国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考虑接受了苏联式的“家庭法独立说”立法模式,但 1986 年《民法通则》颁布后,“家庭法回归民法说”渐成共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人们对家庭法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与新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相对应,“家庭法私法说”迅速成为“家庭法回归民法说”的重要理论产物。“家庭法私法说”主张家庭法属于私法,理应归属于同属私法的民法,通过在家庭法中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建立起全面的权利体系。^[20]可以说,“家庭法私法说”是全面比附“民法私法说”的结果,后者产生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之反拨,更多表达的是对过去曾带来灾难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厌恶,由此,民法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商品经济民法观大行其道: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关于商品所有人的规定,物权制度是关于商品所有权的规定,债于合同制度则是关于商品交换的规定。^[21]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家庭法在回归民法的过程中日益物化,而作为家庭关系本质特征的伦理关系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为平等主体间的契约关系。^[22]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家庭法作为平等主体法的定位,具有先天的理论不足,从而也对其本身带来了巨大影响。

(二)作为平等主体法的家庭法之死亡

家庭法平等主体说目的在于绝对否认国家对婚姻家庭家庭的干预与限制,以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并由此达致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原则。^[23]相应地,家庭法的立法理念经历了如下之转变:立法重心由人身关系移转到财产关系;利益衡量由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向个体利益倾斜;立法基调也从强调管制发展到尊重私权、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权利。^[2]但是,如果绝对地遵循家庭关系的平等,就是预设家庭关系主体作为理性人行为,而将国家干预从家庭领域中完全排除以后,会给家庭关系带来灾难。有学者以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背景,考察了家庭结构在市场经济及其所推行的契约自由原则下所经历的消解:“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不仅普遍地接受了通过‘想象’而来的、西方社会的家庭模式与家庭观

念,而且在行动中也始终以此为摹本来改造并重塑我们的家庭,结果使得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被现代家庭中的‘平权关系’所取代。因而我们看到,在当下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制度中,个人的权利日益被强调,而家庭成员间彼此所应负有的义务却普遍被忽视。”^[24]而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里家庭压力在不断地增加。这其中不仅包括源自经济社会的急速转型所带来的、家庭面临的社会风险的增加,如就业、疾病、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也包括因社会保障制度的解体所导致的、许多原本属于社会或单位承担的责任一下子都压在了家庭的身上,如住房、医疗保险等。”^[24]对家庭主体地位平等的简单宣扬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因为如此一来,“不仅家庭逐步走向市场化,家庭的维系更多依靠的是经济利益,进而使得家庭更多地呈现出经济共同体的特征;而且也造成了家庭成员中‘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甚至‘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滋生,家庭成员之间充满了算计,家庭生活日益功利化,进而导致家庭关系的迅速理性化与世俗化。”^[24]这还导致了社会公共生活的危机四伏,因为虽然年轻一代实现了“为权利而斗争”,但当“他们从家庭中被分离出来成为‘个人’进而走向社会时,他们却无法借助于家庭生活来找到与公共生活、与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进而使得他们不仅因此失去了在家庭关系和结构中的定位,……‘个人’所赖以存存的伦理与道德因此失去了来自家庭的权威的约束。”^[24]可以说,这是对作为平等主体法的家庭法敲响的丧钟。

这些分析揭示出了中国家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本质变化,从伦理实体和基于婚姻家庭生活共同体特有的扶养功能,蜕变成私法自治原则统治下的契约关系,由于过分主张以权利理论全面构建家庭制度,在“一切制度都以权利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宣言下,“男人生育权”、“亲吻权”、“性福权”等权利主张泛滥,本该温馨的家庭变成权利的战场,亲人变成权利的斗士甚至敌人。^[25]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个体,那么家庭就不会存续,人类就不会有自身的再生产。中国家庭的核心价值在这种经济理性的影响下已经凸显出一系列后果:离婚率上升、养老危机、家庭房产纠纷等。^[25]《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早在其征求意见稿阶段,已经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将家庭关系类比为财产关系进行平等式立法的危害,这会导致其成为一种“本末倒置”结构的立法,“它将财产法的平等对待混同于人法的差别对待,过多强调立法技术而导致与现实脱节。”^[26]其正式颁布后,在法学界更是恶评如潮。批评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将原本是人身关系法的家庭法变成投资促进法,这种彻底告别家产制的制度安排将驱赶中国人集体走向鲁滨逊的荒岛世界;该解释将市场逻辑引入到家庭法中,最终摧毁的无疑是家庭本身,其实施更可能引发深刻的不公平,因为它必然侵害婚姻中通常是弱势一方的女性。^[27]法律经济学不无“冷酷”地指出,所有人都是在既定制度和社



会环境中“趋利避害”的有限理性行动者,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当然也不例外。^[27]这样一来,当家庭法的权重偏向于财产的时候,家庭法已经死亡。

四、家庭法的再生:作为弱者保护法的家庭法

(一)统一于公私混合法的家庭法与民法

立足于“家庭法私法说”基础上的“家庭法回归民法说”理论上并不能自圆其说,实践上则走入了重重误区。家庭法的重塑需要新的理论努力。对家庭主体关系平等的证伪宣告了民法平等原则的破产,对民事屈从关系和失权制度的揭示则进一步深化了对所谓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平等主体”的限定不应是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属性的描述,而应是对民法的调整方法的描述,即以平等的方法调整本来就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主体间的关系是民法调整的结果而非前提。^①可见,从民法与家庭法都可以调整不平等主体关系的维度,可以得出家庭法回归民法的第一个共识。第二个共识则是在承认两者都具有公私混合法性质的基础上做到两者的统一。在世界范围内,民法私法说已经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而民法包含的一些公法因素亦已逐渐被挖掘出来。私法的前提是私人可以自治,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却证明人的理性有限,这必然导致国家的家长制完全或部分地取代当事人的意思自治。^[16]作为一种人伦关系的家庭关系之公法性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它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带有鲜明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属性,将保护“弱者”和“利他”的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由此,达到“意思自治”的自律性向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之统一。^[1]

在以上共识基础上审查一些论者就“家庭法回归民法说”提出的理论路径,则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的逻辑紧张。有学者在坚持民法与家庭法都是平等主体法的基础上实现家庭法对民法的回归,^[28]这只能使家庭法最终沦为物文主义的家庭法,因为这样一来,家庭关系中的“人”只能面对赤裸裸的理性人假设并适用私法自治原则,对弱者的保护也就只能沦为空谈。而有“实质回归论”者引用克尼佩尔的论断声称:“就亲属人身关系而言,原先是父权、夫权、亲权在婚姻家庭中占据统治地位,妻子与子女没有完全独立的人格、意志乃至行为能力,但‘现在更多的是对话、利益平衡、自我决定和法定婚龄(在婚姻家庭中)取得统治地位’”。^[29]这完全回避了家庭关系主体实质上的不平等。还有论者在坚持“家庭法私法说”的前提下承认国家权力介入家庭生活的正当性,^[30]这又走向了另一种逻辑断裂,因为这种承认将不可避免导致作为前提的“家庭法私法说”消解。有论者则干脆放弃了让家庭法回归民法的努力,在承认家庭关系不平等的前提下提出“家庭法非私法说”,

从而将其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不同于主张平等原则与私法自治的民法。^[20]可见,只在否认民法与家庭法是平等主体法并承认两者公私混合法性质的基础上,才能为家庭法回归民法创造理论上的统一。

(二)作为弱者保护法的家庭法之再生

家庭法的再生要求其价值取向从“财产”重新回到“人”。从以财产为中心的近代民法到强化人文关怀的现代民法,一场从“财产”到“人”的运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民法的理论范式,这场运动要求以人文关怀重新构建民法的价值理念,注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充分保障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31]家庭法的价值取向与民法的价值取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地契合。有学者明确提出将人的保护确立为未来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为此,“21 世纪民法典的主题却是在异常强大的市场力量、技术力量面前如何来保护人,使之能够避免被市场所规制,被技术所统治。”^[32]基于此目的,对“人”的某些特殊利益的保护应该超越市场机制,在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相对弱小的个体之间进行调节。^[32]

作为弱者保护法的家庭法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法的人文关怀和人的保护功能。2001 年的婚姻法修正案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作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这是对人特别是处于弱势之人的保护,极大地体现了家庭法的人本主义精神。^[33]家庭法的主体是特定的自然人,他们既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年龄上的不同——未成年人、成年人和老人,至于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之区别更是广泛存在。家庭中的弱者正是指在家庭中基于年龄、性别或身心疾病以及经济地位处于相对弱势境况的家庭成员,如未成年子女、年老的父母、怀孕的妻子、身体有残疾以及没有经济收入的家庭成员等。^[34]前面的分析已经雄辩地显示,只有在认同家庭法公私混合法属性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实现家庭法的弱者利益保护功能,因为家庭并非个人的孤岛,“在民主社会制度中,家庭法一般都带有某种公法特点,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干预。”^[35]法律干预家庭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而明确的:如运用共同财产所有权,实现夫妻双方的财产共享,避免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规定亲属扶养义务,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建立亲权和监护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明确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使最脆弱的群体得到最贴切的爱护和扶助;承认配偶权,让利益受损害的一方通过特定程序获得救济,等等。^[35]同时,对弱者的保护并非只局限于女方,男性也会出现病、伤、年老、失业等情况,也有处于弱势的可能。^[36]

还需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弱者保护法的家庭法主张重新审视在“规范平等观”掩盖下两性实际上存在着的不

①对民事屈从关系的介绍,参见徐国栋:《论民事屈从关系——以菲尔麦命题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1 年第 5 期;对失权制度的介绍,参见徐国栋:《论失权》,载氏著:《民法的人文精神》,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9 页及以下;对民法“平等主体”规定的解读,参见蔡立东、张临伟:《“平等主体关系说”评判——兼评《民法典草案》第二条》,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5 年秋季号(第 24 期),第 82 页。



平等,从而对女性给予真正的保护。在法律规范中,经常存在着对待性别差异的两种极端:一种是绝对没有差别,导致立法者缺乏足够的性别敏感度,机械抹煞了两性的生理不同;另一种则是过分强调差别,却忽略了女性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37]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男女平等的法律,并不是最好的法律。^[3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婚姻法将“人”都是视为抽象的“人”,规范时实行无性别差异主义,而这种不承认事实上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10]故而,更应从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着眼,树立“求差别的平等”观。^[39]否则,在抽象的主体平等的幌子之下,会形成事实上的对弱者的宰制。

参考文献:

- [1]曹诗权.中国婚姻法的基础性重构[J].法学研究,1996,(3):100-101,108.
- [2]李洪祥,王春莹.婚姻法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亲属法体系的完善为视角[J].当代法学,2012,(2):99,99.
- [3]徐国栋.家庭法哲学两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46,50.
- [4]雷春红.中国未来民法典亲属法编两议[J].社科纵横,2006,(2):96.
- [5]杨水泉.论婚姻法正名为亲属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J].社会科学研究,1998,(3):65.
- [6]蒋月.婚姻家庭法前沿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5.
- [7]陈苇,冉启玉.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中国婚姻家庭法六十年[J].河北法学,2009,(8):43.
- [8]巫昌桢,夏吟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立法之嬗变[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1):18,19.
- [9]何群.婚姻法领域男女平等权研究——以配偶从事家务劳动的定位为例[J].太平洋学报,2008,(8):55.
- [10]蒋月.新中国60年婚姻立法改革述评:基于性别平等的观察与前瞻[J].海峡法学,2011,(6):7-10,3.
- [11][英]边沁.立法理论[M].李贵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89.
- [1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1.
- [13]徐国栋.论民事屈从关系——以菲尔麦命题为中心[J].中国法学,2011,(5):160-161.
- [14]刘忠勋.论我国婚姻法对男女平等权支撑的有限性[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51.
- [15]周安平.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9.
- [16]徐国栋.民法哲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96-297,321.
- [1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A].梁漱溟选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92.
- [18]徐国栋.魂兮归来!认真地理解亲属法向民法的回归[A].认真地对待民法典[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3.135.
- [19][苏]坚金.苏维埃民法:第一册[M].李光谟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29-30.
- [20]巫若枝.论中国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研究之误区——兼与婚姻法私法论商榷[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5):1.
- [21]徐国栋.民法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3-95.
- [22]巫若枝.三十年来中国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反思——兼论保持与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69.
- [23]李桂林.关于婚姻法的法理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62.
- [24]方乐.法律实践如何面对“家庭”[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4):51,52-53.
- [25]张伟.婚姻家庭和谐的哲学思考——以其他学科与法学的交融为视角[J].河北法学,2009,(5):51-52,50.
- [26]冯源.物文主义的夫妻不动产权属条款——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之规定[J].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49.
- [27]艾佳慧.要“一刀切”的司法解释还是要类型化的判例制度——对《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的批评[J].法学,2012,(1):81,87.
- [28]丁慧.试论中国亲属法哲学的发展方向——兼与徐国栋教授商榷[J].法学杂志,2012,(7):66.
- [29]郑晓剑.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3):166.
- [30]雷春红.婚姻家庭法的地位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5.
- [31]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49.
- [32]薛军.人的保护:中国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6,(4):118,125-126.
- [33]巫昌桢,夏吟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之我见[J].政法论坛,2003,(1):31.
- [34]何俊萍.论我国婚姻法应坚持保护弱者权益的立法价值[A].家事法研究(2012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24.
- [35]马忆南.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功能[J].法商研究,1999,(4):16,16.
- [36]刘丹.弱势群体保护——从宪法到婚姻法[J].社会科学家,2006,(6):83.
- [37]向东.性别回归——社会性别视角下我国法律的检视即对策[J].河北法学,2011,(1):179-180.
- [38]王礼仁.男女平等的法律并不是最好的法律——以女性从政和婚姻诉讼为视角[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2):5.
- [39]马忆南.男女平等的法律辨析——兼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原则[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5):4.

责任编辑 刘芮含